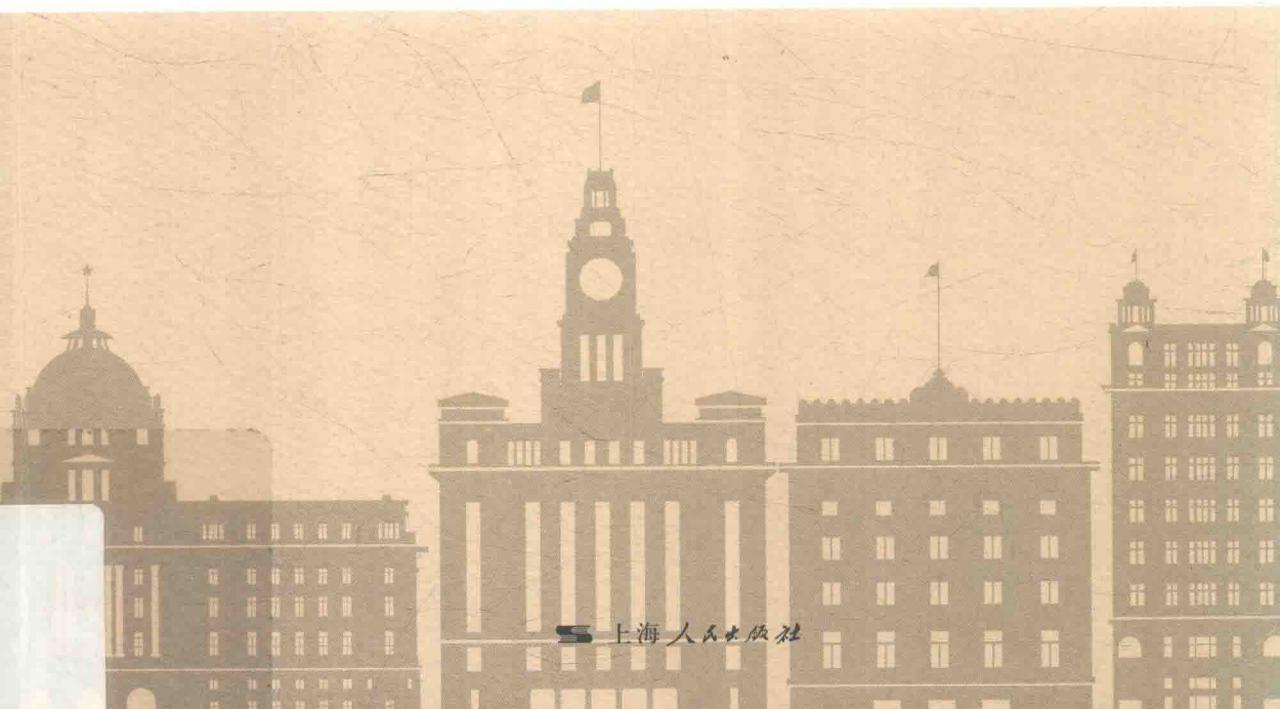




#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

夏金华 主编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40年

研究丛书



# 改革开放40年 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

夏金华 主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 / 夏金华主编.

—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18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208 - 15451 - 3

I. ①改… II. ①夏… III. ①哲学史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0704 号

责任编辑 毛衍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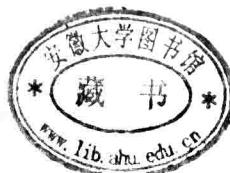
装帧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 · 储平

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丛书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哲学的历史进程

夏金华 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2.5  
插 页 4  
字 数 379,000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5451 - 3/B · 1364  
定 价 98.00 元



# 总 序

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改革开放历程波澜壮阔，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一部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中华民族沿着改革开放的康庄大道，续写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新篇章。

回首40年光辉历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充满自信。我国从农村联产承包到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深圳特区创建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浦东开发开放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从沿海沿边开放到“一带一路”建设，改革开放一次次突破禁区，冲破禁锢，打破常规，革故鼎新。无数雄辩的事实和辉煌的发展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符合中国的国情。改革开放40年伟大实践昭示世人，中国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

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高举改革开放伟大旗帜，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改革，用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改革，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重启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推动形成新一轮改革大潮，改革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断增强，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基本确立。

回首 40 年光辉历程，我们获得弥足珍贵的经验和启示。一个国家要发展、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必然成功，根本的一条是顺应了中国人民要发展、要创新、要美好生活的历史要求，契合了世界各国人民要发展、要合作、要和平生活的时代潮流。纵观当今世界，变革创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世界各国都在加快推进改革创新，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兴起，谁更有智慧、更有勇气，敢于变革、敢于创新，谁就会抢占发展先机，谁就会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改革是对执政党生命力的考验，是国家发展能力和竞争力的根本保证。能否改革、能否持续改革，是对当今世界各国执政党政治潜力和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什么样的执政党具有锐意改革的哲学、文化支撑，就具有延绵不绝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就能在未来的 world 发展格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回首 40 年光辉历程，我们对于改革开放自身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成功，重要的一条是把改革提升到哲学的高度、方法论的层面，用辩证思维把准改革脉搏，妥善处理各方关系，在整体谋划、系统思考中把准改革开放脉搏，在统筹兼顾、

综合平衡中把改革开放全面引向深入，这是中国共产党积累的一条基本的改革经验、执政经验。

一是妥善处理顶层设计与基层积累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更加注重对一些必须取得突破，但一时还不那么有把握的改革，开展一系列先行先试的试点探索，投石问路，然后再把基层积累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提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当然，决定在哪些领域改革、试点哪些举措、在哪些区域试点，这要从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角度去选择。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发展历程一再明示，基层积累要在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顶层设计也要在基层积累的基础上来谋划。

二是妥善处理系统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必须强调系统性、完整性、协调性，不可能再像改革初期在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那样，单兵突进，而是要把改革从以经济为主，延伸到经济社会、文化民生等各个领域。同时，改革又不能平均用力、齐头并进，搞一刀切、齐步走，而是要确立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寻找到把改革推向纵深的着力点。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这两者必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

三是妥善处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胆子要大与步子要稳的关系。搞改革肯定要打破现有的工作格局和体制机制，必然会有风险，不会四平八稳。触动利益的改革，不可能都是敲锣打鼓、欢欢喜喜、轻而易举。各级干部都要有胆量和魄力，必须解放思想，拿出勇气，认准的事就要甩开膀子大胆地干。还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推出改革的具体举措一定要充分研究、反复论证、科学评估，做到稳妥审慎，稳扎稳打，蹄疾步稳。

坚持和推进全面改革开放，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落实人民中心思想不松劲。我们要始终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把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紧紧依靠人民的力量推动改革。我们要紧紧围绕人民所思所想所盼，深入开展社会化宣传教育活动，为改革开放事业凝聚力量人心，营造有利氛围。尤其要增强党员干部对改革开放事业的认同感和使命感，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真心诚意接受改革、拥护改革，引领社会成员自觉地把个体的命运与改革开放事业的兴衰成败相联结，牢固树立以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改革发展成败的标尺的执政理念。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改革开放又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处于迈入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进军的关键期，美好的目标就在眼前，更大风险和考验也摆在面前。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改革开放 40 年伟大历程告诉我们，始终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坚定不移，坚韧不拔，不断把改革开放向全面、系统、纵深推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唯一选择。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一中、二中、三中全会的战略安排和部署，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继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当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一以贯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承担了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的

先行先试任务。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是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解决政府管得太多、太全的问题，探索形成以简政放权、转变职能为核心，以创新方式、提高效能为重点，符合现代治理体系要求、对标国际高标准贸易规则的政府服务管理新模式；上海建设科创中心，是要让我国在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为主，向以创新驱动发展为主的发展模式切换中，能够走到世界前列；上海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推出“1+6”文件，是要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上海率先出台国资国企改革“20条”，是要实现从“管企业”向“管资本”的转变；上海积极探索司法体制改革，是要率先建立符合司法规律和职业特点的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此外，上海还承担了“营改增”税制改革、群团改革、高考综合改革和教育综合改革，等等。这一系列改革使得我们的各项制度、政策更加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这种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精神，也成为上海和国家保持发展活力、前进动力的重要支撑和思想驱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年之际，总结上海经验，为深化我国改革开放事业源源不断提供上海的新思考和新方案，是我们责无旁贷的时代重托与使命担当。

广大社科理论工作者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年为契机，继承和发扬改革开放精神，把我国改革开放基本进程、主要成就、基本经验和内在规律系统总结好、深入挖掘好、广泛传播好，切实转化为学习思考能力、理论创新能力和学术原创能力，使之成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出发点和着力点。我们要更好地结合当代中国实际，立足各学科领域，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和价值导向，以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实践，以中国实践丰富中国理论，在守正出新、博采众长中推进理论和学术创新，

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史和相关理论研究，为形成布局合理的学科体系、植根中国的学术体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出贡献。

2017 年，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办公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启动实施了上海市“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研究。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上海多所高校和社科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历时一年辛勤工作，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按照“论从史出”“史论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回顾中国和上海 40 年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尊重学术规律，凝练理论思考，打造标识概念，构建话语体系，取得了“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系列研究成果。现在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汇编成这套“上海市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研究丛书”。本丛书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哲学、法律、科技、教育、国际关系等多个学科领域，对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全方位阐释和理论解读，对当下我国发展面临的众多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展开学理论证，谋划应对举策，为我国改革开放再出发提供学术性探索和学者版建议。本丛书能够代表上海学术界对于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思考水准，呈现了上海社科理论界应当具有的历史责任，反映了社科理论界对我国改革开放未来发展和综合国力继续提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愿景。

是为序，以纪念改革开放 40 年！

燕 爽

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

#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返本开新时期（1978—1987）	13
第一节 易学	15
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	26
第三节 两汉经学	39
第四节 魏晋玄学	43
第五节 隋唐佛学	47
第六节 宋元明清儒学	50
第七节 道教哲学	74
第八节 近现代哲学	82
第二章 “以西释中”时期（1988—1997）	98
第一节 易学	99
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	119
第三节 两汉经学	136
第四节 魏晋玄学	139

第五节	隋唐佛学	144
第六节	宋元明清儒学	153
第七节	道教哲学	170
第八节	近现代哲学	200
第三章	反思彷徨时期（1998—2007）	218
第一节	易学	219
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	234
第三节	两汉经学	248
第四节	魏晋玄学	250
第五节	隋唐佛学	258
第六节	宋元明清儒学	268
第七节	道教哲学	284
第八节	近现代哲学	335
第四章	面向未来时期（2008—2017）	356
第一节	易学	357
第二节	先秦诸子学	367
第三节	两汉经学	390
第四节	魏晋玄学	394
第五节	隋唐佛学	404
第六节	宋元明清儒学	419
第七节	道教哲学	443
第八节	近现代哲学	478
后记		507

# 绪 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从过去划分唯心、唯物二论对立的窠臼中走出来，在受到“以西释中”方式的全面影响之后，又经过激烈的自我认同和合法性的反思，进而逐步摆脱在观念和方法上对西方哲学的依赖，探索和建立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建构、走向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历史过程。

从 1978 年至今四十年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是我国当代思想的精华之一。通过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研究的整个过程可以看出，若从学界代际来说，大体上可以分为以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其《中国哲学史新编》、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四卷本）》、冯契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肖筮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冯达文、郭齐勇主编的《新编中国哲学史》等为代表的国内老一辈哲学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哲学史完全体系性的研究方式逐步走向终结。其后，在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重版）、《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的激励之下，涌现出以陈来、杨国荣、方立天、卿希泰等学者为典型的第二代学者群，其代表作分别为

《朱熹哲学研究》《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中国道教史》等，体现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型与发展，采取“以西释中”的方法，在内容上偏重于哲学的断代史、著名哲学家的思想理论，以及哲学概念、范畴等的研究。至于第三代学者群，国内学界目前尚未产生公认的代表性学者，呈现出各自辛勤耕耘、力争上游的局面。如果以立场与方式来划分，这一时期从过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一家独大研究中国哲学，以苏联哲学家日丹诺夫唯心、唯物两大阵营对峙的观点局面，转变为深入反思，采取更加客观、多样性的立场与方法，包括中西哲学比较、以西方哲学的框架解读、探讨中国哲学的特质与内涵等方式。

随着国内学术氛围的活跃，尤其是 2001 年爆发的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大讨论<sup>①</sup>，其背后表现出高度的哲学学科自觉意识与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诉求，推动了研究方法与论文、著作的日趋多元化。假如从哲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说，又可粗略地分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教科书哲学”、80 年代以反思“教科书哲学”为主要内容的哲学变革

<sup>①</sup> 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刊于《中国哲学年鉴》2001 年号，《哲学研究》2001 年）一文，和北京大学陈来的一篇文章在国内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国内学界为此主办过多次专题研讨会，并有七、八种人文社会科学类杂志组织刊发了相关的笔谈、专栏等，报刊杂志和学术研讨会发表的相关论文超过 100 篇。曾有学者指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百年回顾……是中国哲学真正走向世界的历史性大反思。”（陈志良：《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 年第 3 期）2003 年 10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与文化研究所联合主办了“中国哲学：观念与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法、日、澳等国家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是会上热烈讨论的焦点之一。

和 90 年代以来以现代性反省为主要内容的“后教科书哲学”，以及进入 21 世纪，中央实施一系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战略决策指导下，中国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理论成果。上述几种论述方法基本体现在郭齐勇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张海燕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孙正聿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杨国荣的《中国哲学 30 年（1978—2008）的反思》、徐洪兴的《鉴往瞻来——儒学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许多著作或论文中，毋庸赘述。

中国古代哲学，在《易经》之下，有诸子百家之说，然贵为显学者，不过儒、墨二家而已。<sup>①</sup>后墨学中绝，唯孔、老二家，最为抵牾，汉司马迁《史记》有云：“世之学老子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再往后，是儒学独尊。到了东汉末年，佛教传入。经过魏晋、南北朝约五百多年的传播，与儒道周旋、磨合之后，成功站稳脚跟，渐次坐大。至隋唐时代，居然有了问鼎思想界的雄心。所以，议论中国思想，其要不出儒、释、道三家的学说，古人早有定论。再加上易学，中国思想已基本囊括其中了。为何没有老、庄的位置？因为从根本上说，老子、庄子的思想有后来道教的承继；又贯通儒学与佛学，且被此两家逐步蚕食，千载之下，除道教外，老庄注疏，非儒即佛，终于促成了三教的圆融，老、庄自是没有再另立一派的必要了。这有点像古代印度教的做法，不断地吸取佛教的精华而壮大自己，竟使得对方没有

<sup>①</sup> 《韩非子·显学篇》云：“世之显著学者，儒墨也。”

了生存的地盘<sup>①</sup>，手段非常高明。儒、释、道三教之所以走近，是由于它们之间既同又不同。同者，是它们的目标方向基本一致，都主张成圣、成贤或“真人”，只是境界的高低、远近有别；所不同者，各有一套相互取资、光大自家受用的本事，如僧肇以《庄子》笔法写《肇论》，宣扬“缘起性空”的教义<sup>②</sup>；道教取“佛性”之说，于《灵宝本相运度劫期经》中提出“一切众生，皆有道性”。儒家呢，一方面痛诋“夷狄之术，行于中华”<sup>③</sup>，另一方面，又不得已，如李翱变僧肇之所为，以佛义说儒学而不引佛典之文。<sup>④</sup>

① 关于古代印度佛教灭亡的原因，学界有多种说法，但最有共识的不外两种：一种是由于 13 世纪伊斯兰教的入侵。但这个说法未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伊斯兰教不仅仅消灭佛教，婆罗门教、耆那教等一样被摧毁，为何他们后来得到了恢复，而佛教却没有？另一种是受到印度教的逼迫所致。其中起最大作用的是出生于西南印度伽拉迪（Kaladi）的一个婆罗门家庭的商羯罗（Śāṅkara, 700—750）。他通过批判佛教的空有、中观、唯识等学说，将其消解，融入到印度教教义中，建立了最高“梵”的理论，《梵经注》（Brahmasūtra-bhāṣya）是其代表作。并在论辩中，不断击败佛教使许多佛教徒改信印度教，世人称之为“假面的佛教徒”（pracchaumbauddha）。同时，又效仿佛教建立四大修道院，组织“十名教团”（Daśnamis），从理论和组织两方面对佛教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使之急剧衰落。后经伊斯兰教摧残，佛教终于消亡殆尽。

② 东晋僧肇著《肇论》，内分《般若无知论》《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和《涅槃无名论》四篇。从“本末”“有无”“名实”等主、客体等都没有独立的本性（自性），论证世界原来是“空”；必须去掉一切世俗的认识——“惑智”，才能达到佛教所说的“真智”，论证了对“空”的认识只能用“无知”的“般若”，完整地阐述了佛教的思想体系。

③ [唐] 李翱《去佛斋论》，《全唐文》卷六三六，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7 册，第 6424 页。

④ 明陆树声《清暑笔谈》云：“李翱《复性篇》，主排佛也，而间用其言；王坦之《废庄论》，以反庄也，而多袭其语。此文章之操戈入室者。”（《陆学士杂著十种》，《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 163·杂家类》，齐鲁书社 1995 年版，第 315 页）宋僧贊宁则认为，该书“明佛理不引佛书，援证而征，取《易》《礼》而止。可谓外柔而内刚逆也。”（《高僧传》卷十七《药山惟俨传》后“系曰”，《大正藏》第 50 册，第 816 页下）

赵宋二朝，程颐是“偷得佛说为己使，是为洛学”，从而挑起了一桩真伪论辩的公案。<sup>①</sup>三家之间，频繁互学，逐步形成思想理论上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局面，共同促成和巩固了中国思想界三分天下的格局。

三分天下者，儒学为首，佛教次之，道教居末位。如果就宋明以降儒学与佛学的交涉、融合而论，儒家最重要的理论建树约在三个方面：心性之学、实践工夫与悟道境界。此三者本都是佛家的拿手好戏。心性学说，属于哲学思想范畴，近世以来，学界大佬的研究较多，成果丰硕。其中的宋明大儒，除了去追溯先秦时期的儒学精神获得新动力之外，佛学的刺激与启发，自是难免。但是，后两个方面问题——工夫与悟境的探讨，尤其是其思想真实来源的问题，以及与佛门的深厚关系之索解，不仅明显落后于心性之学的研究，且遇到的瓶颈极大，学界对这种情形仅有学理上的描述，但缺乏明显的深入与突破。近来有学者提出，将功夫引入哲学<sup>②</sup>，多半即为此也。

中国哲学的最大特色，是历代的文人士大夫能够不断地从古代圣贤的文字中寻找“微言大义”，汲取智慧；结合时代的需要加以诠释，作为自身的受用以及治国理政的参考和实践。一代又一代，前朝的经验和教训成为当下现实的继承和殷鉴，至今依然不失其意义。其原因在于，古代圣贤们的思想主张，指涉宇宙人生的大道，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具

<sup>①</sup> 宋叶梦得《石林过庭录》记载程颐弟子谢良佐的话说：“伊川参某僧，后有得，遂反之，偷其说来作自己使，是为洛学。”朱熹认为此说“固不足信”，并分析其由来的原因，以回答学生的提问（参阅《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六，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40—3041页）。

<sup>②</sup> 倪培民《将功夫引入哲学》，《南京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有普遍永恒的内在价值。

当代四十年来的中国哲学，虽说时事更易，研究方法有异，关注的重点不一样，但在精神层面上依旧没有偏离上述主题。相对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所取得的成绩，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sup>①</sup>，但总体来说，进步是非常显著的，无论是研究人才的聚集，还是相关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乃至研究的方式与方法，均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值得肯定与称道。但是，由于哲学是不断更新、不断进步的研究领域。即便以往存在类似的论文或其他的研究综述，也需要不断地将新的成果整合进学科框架中去，同时，凭借新成果对旧有的认识框架作出调整和优化。因此，这个领域尚有进一步全面研究的必要和空间，理由有四：

第一，所有以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其时间下限均在 2008 年或 2009 年，还有更早一些的，以此下限到 2018 年尚有将近十年的空白。这段时间正是学术氛围日趋宽松，大批青年才俊不断加盟之时，“百花齐放”的局面已经形成，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虽然从学术水准的角度观察，尚显稚嫩，但前景可期，有目共睹。

第二，前期的研究由于多种原因，加之侧重点不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研究方法上都显得不够完整，需要补齐，使这一时期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得到全面的体现。

<sup>①</sup>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就中国哲学研究来说，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如下成绩：（1）已建设成为一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专门学科；（2）培养和组成了一支拥有四五百名专业工作者的队伍；（3）取得了一批科学研究成果，计有论文 600 多篇，专著、古籍点校、注释和资料编纂，以及译著 200 多部（《中国哲学史研究概述》，《中国哲学年鉴》1982 年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1 页）。